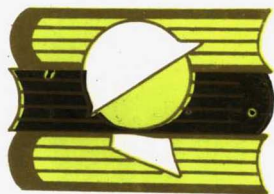


少年 百科 丛书

●●● 精选本



中国音乐家的故事

梁茂春 等

shao nian baikecong shu jing xuan ben

- 全国第一套以少年为对象的大型丛书。
- 着眼于启发思想，丰富知识，培养能力，引起兴趣。
- 被专家、学者誉为“通向知识海洋的窗口”，“哺育巨人的乳汁”。
- 1978 年出版以来，累计印行 5000 万册。
- 原教育部曾发出专门文件向全国中小学生推荐。

●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目 录

沈心工	1
李叔同	11
肖友梅	19
王光祈	26
黎锦晖	36
赵元任	45
青 主	53
刘天华	61
张寒晖	71
黄 自	77
冼星海	84
张 曙	94
聂 耳	102
向 隅	112
麦 新	122

安 波	131
马 可	137
郑律成	147



沈 心 工

(1870—1947)

二十世纪初在我国出现了废科举、兴办新式学校,努力学习西方文明的新潮流。沈心工先生便是在我国开设的新式学堂中最早创立乐歌课的人。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就认识到:音乐能增长儿童的美感能力,能陶冶儿童的健康情操,开设乐歌课是影响民族素质的大问题。因此他和一些志同道合者毕生奋斗,使乐歌课成为新式学校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,成为社会文化生活的一种新风尚。

沈心工名庆鸿,号叔逵。心工是他的笔名。他是上海市人,清末同治九年(1870年)农历正月十五日出生。他家祖辈从事商业,后来家道逐渐衰落。沈心工幼年时在家塾跟他大哥读“四书”“五经”。大哥是个秀才,国学根底好,对心工十分疼爱而又要求严格。两人既是兄弟,又是师生,情谊深厚。光绪十六年(1890年),心工二十岁时也考中了秀才,得第二名。这一

年他的大哥突然因病去世，他就接替了大哥在上海教家馆。后来，才在约翰书院(约翰大学前身)教国学。

这时期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，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深，中国处在空前的民族危难之中。救亡图存、维新变法的思潮迅速高涨，上海的知识界更为活跃。这时的沈心工也开始热心地读新书，谈西学，议论时政，关心国家命运。大量的新鲜思想和知识打开了他的眼界，他决心抛弃走科举道路寻求出路梦想。1897年，已经是二十七岁的沈心工，竟然又去投考刚刚兴办起来的南洋公学(今交通大学前身)师范班，立志办教育，开民智，育人才，走“教育救国”的道路。

沈心工在南洋公学这所新式学堂里，不但刻苦地学习数学、物理和英文等新课程，而且还经常到校外听一些名人讲学，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新学说。为了实践师范教育，他和几个同学一起筹办了南洋公学附属小学，亲自讲授国文、物理等课程。当时这所小学的学制和课程设置都是仿效日本的，但音乐一科由于缺少师资，未能开设，这对沈心工同来说，真是憾事。

1902年4月沈心工自费东渡日本考察师范教育。沈心工年轻时曾受到民族传统音乐的熏陶，会吹箫、笛，会拉胡琴，会唱昆曲；后来在约翰书院教书时还接触到西洋音乐知识。到日本以后，他发现学校音乐教育发达，音乐在人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，特别是学校的唱歌课使他很感兴趣。于是他邀集在东京学音乐的曾志忞等数人，在我国留学生中发起组织“音乐讲习会”，请日本的音乐教育家、东京师范学校教授铃

木米次郎讲学。从此，沈心工开始研究学校歌曲的编写与创作。他的著名的歌曲《体操——兵操》（又名《男儿第一志气高》），就是他在东京时的第一首习作，也是我国最早的学校歌曲之一：

男儿第一志气高，年纪不妨小，
哥哥弟弟手相招，来做兵队操。
兵官拿着指挥刀，小兵放枪炮，
龙旗一面飘飘，铜鼓咚咚咚咚敲。
一操再操日日操，操得身体好，
将来打仗立功劳，男儿志气高。

这首生动活泼的儿童歌曲，后来在国内风行一时。1906年，李叔同在他创办的我国第一本音乐杂志所刊登的《昨非小录》中曾谈到：“学唱歌者，音阶半通，即高唱‘男儿第一志气高’之歌；学风琴者，手法未谙，即手弹‘5566553’之曲”。“5566553”，就是这首歌的开头曲调。由此可见这首儿童歌曲是深受人们喜爱的。

1903年2月，沈心工从日本归国，仍然在南洋公学附小任教。他认真地编写唱歌教材，各处筹划经费，一个月后就开设了唱歌课。他自己一面弹奏风琴，一面教学生唱歌。从此，校园内琴声洋溢，歌声飘荡，学生们的精神为之振奋。为了使歌曲能在其它学校和社会上推广，他还不辞劳苦地到上海务本女塾、南洋中学、龙门师范以及李叔同等人创办的“沪学会”等单位兼课，同时，还邀集各校爱好音乐的教师，在假日聚集

一堂，由他义务教唱和讲授乐理，从而影响了一批人来从事音乐教学工作。这些活动在当时是开创性的，在我国音乐教育史上是空前的。

沈心工在南洋公学附小从事教育长达三十年。其间，他虽然当过校长，又兼任大学部的训育主任，要操持整个学校的校务，但他始终不忘将心血倾注在音乐教育上，把它作为培养学生德、智、体、美全面发展的组成部分。他认为：唤起少年儿童美的情操，培养他们对于美的锐敏的感受能力，这是美育的任务。关于创作什么样的音乐，他说：要想感动一个时代的人们的感情，必须创作这一时代的音乐，这是必然的趋势。关于唱歌与道德、理想的关系，他肯定说：唱歌可以把道德教育与优美理想融合在一起，激发人们的天赋良知。因此，他编写的歌曲总是要求合乎时代潮流，合乎少年儿童的心理与审美情趣。为了使学生明白歌词的意义，他敢于打破陈规，用白话文来编写歌词，写得浅而不俗，简明易解，既富有深刻的教育意义，又有鲜明的形象性。如《黄河》、《爱国》、《从军》表现富国强兵的理想；《缠足苦》、《女子体操》、《中国女杰》提倡男女平等；《地球》、《电报》、《铁匠》宣传科学知识和现代文明；《革命军》、《美哉中华》、《革命军凯旋》直接歌颂民主共和政体，等等。歌词中表现儿童生活情趣的更是多种多样，如《赛船》、《竹马》、《龟兔》、《请君对镜》、《运动会得胜歌》等，都深受小朋友们的欢迎。

由于歌唱在学校刚刚兴起，歌曲创作的力量是很薄弱的。此时的学校歌曲，大多借用欧美和日本的歌曲的曲调填写新

词。沈心工共编写歌曲 180 余首，自己作曲的只有六首，大部分是用现成曲调填词，即使是填词的歌曲，他也很注意使曲调的情感、韵律和节奏与歌词相配合，使歌词的音调、节奏随着曲调的音势而有变化，唱起来自然、顺口，感情充沛。如《女子体操》的曲调来源于莫扎特的《各种小鸟尽来到》，他填配的歌词是：“娇娇，这个好名词，决计吾们不要。我既要我学问好，我又要我身体好。操操，二十世纪中，吾辈也是英豪。”这首歌曲唱起来悦耳顺口，不仅女学生们爱唱，就连男教师和男学生也很喜欢。

在沈心工编写的歌曲中，有少数几首用的是我国传统的民间小调，这是非常难得的。如《缠足苦》用的就是家喻户晓的《孟姜女小调》；《采茶歌》用的是《凤阳歌》曲调。缠足是我国历史上的一种陋习，《缠足苦》则是用歌曲对这种陋习的批判。

他自己作曲的有《黄河》、《采莲曲》、《革命先革人心》等六首。其中《黄河》是他与杨度合作的一首优秀作品，在当时广为流传。

这首歌曲大约作于日俄战争后的第二年——1906 年。它通过歌颂黄河，控诉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，表达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。黄自对《黄河》曾给予很高评价，说：“这个调子非常的雄沉慷慨，恰切歌词的精神，国人自制学校歌曲有此气魄，实不多觐。”

沈心工编写的歌曲，早在清光绪三十年（1904 年）就由他自己苦心经营汇集成册出版，名为《学校唱歌集》，共有三册。它是我国最早的歌集之一，对推动全国开展新式音乐教育，起

了极大作用。民国元年(1912年),沈心工担任附小校长,工作非常敏重。他见到民国成立后人心振奋,当局对唱歌课比较重视,他也很受鼓舞,于是废寝忘食,夜以继日,重新编订《学校唱歌集》六册出版。次年,又编《民国唱歌集》四集出版。象他这样重视音乐教材建设的,在当时实不多见。他对音乐教育事业的热忱,真是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的。

沈心工教学生唱歌时,不但声音宏亮,富有表情,还不时边唱边表演,造成一种生动、活泼的效果。如《体操——兵操》、《客来》、《卖布》等歌曲,他都加上表演动作,来加强歌曲的艺术感染力。有一次,我国最早的女子学校务本女塾举行女校运动会,该校附设的幼稚园中的小朋友出节目助兴,其中就有表演唱《体操——兵操》。小朋友们随着琴声,一面唱歌,一面表演,轰动了观众。领头的就是沈心工的长子沈葆琦。

沈心工在教学中,很注重培养儿童掌握实际的音乐技能,他的教学方法是多样化的。他在歌集序言中说:教授儿童唱歌,不在多授新课,而在于要使儿童能随时随地独立应用。教师要善变方法,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。从教工尺谱改为教简谱的过程中,他为了使学生熟悉 do、re、mi、fa、so、la、si 七个唱名,就用谐音(近于上海方言)编成“独览梅花扫腊雪”的诗句,对照着唱名进行教学,引起学生的浓厚兴趣,很容易就记住了。早在1905年刚刚草创音乐课期间,他就辑译并出版了日本石原重雄著的《小学唱歌教授法》。这本书对歌唱教学的目的、内容和方法都作了详尽的论述。书中有些地方沈心工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作了说明。这是一本很珍贵的

史料。

沈心工在南洋公学附小任教时，曾经有过一段光荣的革命经历。辛亥革命那年（1911年），在武昌起义胜利的影响下，上海也很快地起义响应，宣布独立。十一月三日，当起义军和群众攻占了上海江南制造局后，沈心工和许多同伴也涌到制造局，兴高采烈地庆贺满清政府的垮台。他还在学生中教唱起他自己选曲填词的《革命军》一歌，歌中唱道：

吾等都是好百姓，情愿去当兵；

因为腐败清政府，真正气不平。

收吾租税作威福，牛马待人民；

吾等倘使再退缩，不能活性命。

几天以后，经人推荐，上海军政府请沈心工参加光复上海附近的青浦县的行动。沈心工少年时期曾在青浦县外婆家住过七、八年，比较熟悉乡情。这时，他对革命充满热情，就欣然答应去执行这一任务。一天夜晚，他剪掉了辫子，脱下了长袍，穿上马呢布操衣，气度轩昂，带着改装成普通乘客的十二名士兵，藏好步枪，乘船出发。次晨到达青浦，沈心工率领士兵直逼县衙门。当时清政府大势已去，县官闻风而逃。沈心工在衙前拔出手枪，朝天开了一枪，就顺顺当当地把县衙拿下，然后在堂上当众历数清政府的腐败，宣布建立民主共和政府的革命意义。此后，当地士绅和群众就想留沈心工担任青浦光复后的第一任地方官。他婉言谢绝，仍然回到南洋公学附小继续从事教育工作。

1927年春，由于时局激荡和学校人事变动，他被迫忍痛离开了南洋公学附小。当时江苏省民政厅长是他早年师范班同学，再三年来邀请他出任南汇县县长。他几次推辞不掉，终于在同年八月上任。他一心想替南汇县百姓做些好事，如常去各乡视察，以图改良民政。他每出外巡视，完全平民化，有时还象教师一样向民众演讲，甚至还教唱他自己所编的歌曲。当地人民认为，如此作风的县长，是前所未有的。他总共当了125天的县长，终因弊政难改，困难重重，不合志趣，无所作为，而辞职离去。南汇县人民为了表示对他的敬仰，以后每逢秋天便特意派人送一盆菊花给他。

1927年，沈心工五十七岁，他辞去南汇县县长以后，就再也没有外出任职，晚年是在书斋里渡过的。他的书斋名叫“归鹤轩”，说起斋名还有一段故事。他原来喜爱民族音乐，藏有一张家传的絳色璐琴，但在他热衷于西学时，这琴却被卖掉了。以后，他在工作中逐渐感到需要重新研究民族传统音乐，于是四处打听这张琴的下落。一天，有人将原琴送回，沈心工十分高兴，特地写了《归鹤记》一文，叙述自己对中西音乐文化看法的转变和理想，同时把自己的书斋定名为“归鹤轩”，以为纪念。

在这书斋里，他陆续完成了《家庭历史小说》；考订、整理了《丽(bi)琴琴谱》，这谱原是他善弹古琴的伯公、清代画家沈维裕编订的。他还孜孜不倦地重新修订了自己一生所作的歌曲，将简谱译成五线谱，从中精选出82首，汇集成《心工唱歌集》一册出版。除自己作序以外，他的老同学吴稚晖和音乐家

黄自也各写序言一篇，赞扬沈心工的歌曲风行最早，盛极南北，非但有历史意义，歌曲本身也自有价值，合乎中小学音乐教材的标准。歌集在我国音乐教育史上是有特殊意义的。

1937年，抗日战争爆发，上海沦陷，沈心工忧愤交加，精神日渐衰老。幸好，这时经友人沈草农介绍，他结识了上海“今虞琴社”的张子谦、吴景略等古琴家，经常参加琴社活动，共同致力于振兴古琴艺术。为了掌握琴曲的各种流派，他还向常熟琴家吴景略学习梅庵派的曲目《长门怨》和《玉楼春晓》。沈心工特别喜欢后者，觉得它婉转动听，适合咏唱。于是他便填上唱词，将节奏稍加变化，定名为《春光好》：

春光好，真气象，豪华恰似少年人。

它耐得九九寒，今和暖，倍精神。

春到人间便热闹，处处游人欢笑。

.....

以后，这首琴歌就成了琴友们经常演唱的曲目，表达了他们在日寇统治下，憧憬着美好的春天和热爱生活的心情。

1945年，抗战胜利。沈心工已经到了暮年，现实生活使他感到茫然，加上病魔缠身，十分痛苦。于是，他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。1947年9月5日，他在上海逝世，终年七十七岁。遵照他的遗嘱，遗体火化后，骨灰撒向了滔滔的黄浦江。

沈心工的生前好友黄炎培先生等，曾发起“心工音乐年奖”以资纪念，结果未成。将近四十年后的今天，侨居在美国的沈葆琦夫妇，为了纪念他们的父亲沈心工和发扬光大祖国的

音乐事业,热忱地向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提供了“沈心工音乐奖学金”。

(俞玉滋)





李叔同

(1880—1942)

“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，天之涯，海之角，知交半零落。一瓢浊酒尽余欢，今宵别梦寒。”

这首叫做《送别》的歌，是我国近代音乐家李叔同 1915 年作词编配而成的。这首歌曾被当时许多学校的少年儿童歌唱，所以，当电影《城南旧事》用这首歌作主题歌在银幕中出现时，不少上了年纪的人，仍能按着拍子吟唱，重新体验到半个多世纪前的童年情景！

李叔同(1880—1942)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艺术家与教育家。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早期启蒙者，他一生从事各种艺术活动，在音乐、戏剧、绘画、书法、金石、诗词等艺术文化领域都有建树，同时还培养了一大批艺术人才。

李叔同小的时候，知识面就很宽。他自幼喜欢读《左传》、

《史记》，还向老师学习古典诗词、书法及篆刻艺术。到了二十一岁时，李叔同便刊行了《李庐印谱》与《李庐诗录》。

青年时期的李叔同血气方刚，风东正茂，怀有较激进的变革社会的思想。当时的旧中国由于封建统治的腐败，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国家贫穷落后。当康有为、梁启超提出改良主义主张提倡维新变法时，赢得了许多抱有改造旧中国意愿的进步青年的推崇，李叔同就是其中之一。1898年，当戊戌变法失败之后，李叔同曾篆刻了一块印石，上面写着“南海康君（指康有为）是吾师”，以此来寄托自己的情怀。这以后，他的老朋友谈到李叔同和他的母亲南下寄居上海的原因时，除提到家庭因素外，还有“戊戌政变后，京津之士有传其为康梁同党者，乃奉母南迁”的说法。

李叔同到了上海，就在南洋公学读书，他和黄炎培、邵力子等都是教育家蔡元培先生的学生。据蔡元培先生说，李叔同当时的经济特科里是一位高材生。在读书期间，李叔同仍然从事各种艺术活动。他和友人一起筹设了文化社团“上海书画公会”，上海的名画家任伯年、朱梦庐和书法家高邕之等都参加了这个文化团体。青年李叔同文才超群，在“沪学会”的征文比赛中曾三次获得首奖，深得人们的称赞。

李叔同这一时期重要的社会音乐活动是编配、出版了《国学唱歌集》初编第一册，歌集中载有学堂乐歌十首，其中编收的《祖国歌》曾经在当时的“乐歌运动”中广泛流行，为一般男女青年传诵，并被许多学校用作音乐教材。《祖国歌》中唱道：“上下数千年，一脉连，文明莫与肩，纵横数万里，膏腴地，独享

天然美。国是世界最古国，民是五州大国民”，充分显露出要求振奋中华民族，发扬国威的爱国热情。这首歌采用传统曲调《老六板》填配，具有淳厚的民族风格。经重新编配后，歌曲充满了朝气和豪迈之情，反映了清末时期的资产阶级民权思想，对旧有的封建保守思想是一个冲击。李叔同是很珍爱这首歌的，在由黄炎培先生保存的李叔同亲笔抄写的《祖国歌》手迹上，李叔同在歌谱上方画了一群鸣啼的燕子，下方是敞开窗子的茅屋与萌发新芽的树枝，这暗喻着古老的土地上应长出新芽，唱出新歌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。

1905年，李叔同东渡日本，留学于东京上野美术专门学校，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位出国学习音乐、绘画的进步知识分子。李叔同在东京学习期间，受民主思想的影响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组织的“同盟会”。这时，他的变革要求主要体现在新文化、新思想的传播和各类艺术活动中。李叔同是我国最早学习西洋音乐的人，他除了学习作曲理论之外，还主攻钢琴。据说因为手指拉距太短，还特地进医院动了手术，把指膜割开以适应钢琴演奏技法的需要。

留学期间，李叔同不仅研读音乐、绘画，还从事戏剧艺术活动。他得到日本戏剧家藤津二郎的指导，与曾孝谷等创立“春柳社”，研究西洋戏剧并公演新剧。他们当时所演的剧本，都是一些西方文学名著，如《茶花女》、《黑奴吁天录》等。李叔同在《茶花女》中男饰女装扮演女主角获得成功，得到中外人士的赞赏。当时也在日本留学的我国戏剧界前辈欧阳予倩，就是看了这次演出深受感动而加入“春柳社”的。欧阳予倩以后

在《自我演戏以来》一文中写道，“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有个社，叫‘春柳社’，中坚分子当然首推曾、李……，老实说，那时对于艺术有见解的，只有息霜（李叔同丧母后改的名字）。”当时日本报纸也评论其演出说：“李君的优美婉丽，非日本的俳優所能比拟。”“春柳社”的艺术活动是中国话剧的开端，它的活动也在国内激起极大反响，燃起中国新剧界的第一把烽火，以后上海相继成立话剧团，并在新文化运动中展示出它的旺盛生命力。话剧这一崭新的艺术形式扎根于中国，是与李叔同这位先行者的艺术活动分不开的。

李叔同 1906 年在日本编辑、出版了我国最早的一本音乐期刊《音乐小杂志》，并且向国内发行。他创办刊物的抱负在于用音乐唤起民心，促进社会的改革与进步。在《音乐小杂志》中，刊登有李叔同创作的三首歌曲，这些歌不同于过去多数学堂乐歌仅仅是用旧有曲调填配新词，而是以五线谱记写、自己创作词曲。这三首歌曲是《我的国》、《春郊赛跑》、《隋堤柳》。《我的国》是一首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的乐歌。歌曲以深沉稳健的旋律唱颂祖国的大好河山，并在其中寄托着希望祖国强盛壮大的爱国热情。《春郊赛跑》是一首富于朝气的反映学生生活的乐歌。《隋堤柳》则是三首乐歌中最富激情和艺术性的一首，情怀感触较深，蕴积着真挚的对祖国处境的忧虑之情，是我国近代早期音乐创作中较完美的一首作品。

1910 年 3 月，李叔同重归故土，先在天津工业专门学校和直隶模范工业学校任教，后去上海，任城东女学音乐图画教师，从此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。这时，李叔同仍然怀着爱国热